

A Comparative Study of Converged Media Oper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U.S. from a Social Network Perspective

Zhaoyang Hu

Suzhou Art&Design Technology Institute, Suzhou, Jiangsu, 215104, China

Abstract

The global media landscape is undergoing a profound transformation toward convergence, with its pathways and forms varying according to social contexts and national conditions. Taking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as the core theoretical framework, and integrating media ecology and convergence culture theory, this study systematically dissects the operations of converged media i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It argues that there are paradigmatic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nations in terms of the generative logic, topological structure, key nodes, and relational dynamics of their social networks in converged media. The United States has developed a “capital-aggregation network” driven by capital mergers and algorithmic recommendations, characterized by high centralization and modularity, operating under the logic of market liberalism. In contrast, China has constructed a “system-synergy network” guided by administrative integration and strategic coordination, emphasizing closed loops and controllability, deeply embedded in the modernization of national governance. Through a structural lens of social networks, this paper not only reveals the inherent mechanisms, strengths, and weaknesses of the two models but also delves into the structural dilemmas they face, such as the “innovation paradox” and “ecological imbalance.” It offers critical reflections and operational attributions for understanding the diverse future of global converged media development.

Keywords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Converged Media Operations; Media Ecology; Convergence Culture

社会网络视角下中美融媒体运营对比研究

胡朝阳

苏州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 中国·江苏 苏州 215104

摘要

全球媒体生态正经历一场深刻的融媒体化转型,其路径与形态因社会语境和国情现状而异。本文以社会网络分析为核心理论框架,结合媒介生态学与融合文化理论,对中美两国融媒体运营进行系统性解剖,本研究认为,中美融媒体的社会网络在生成逻辑、拓扑结构、关键节点与关系动力上存在范式性差异,美国形成了以资本并购与算法推荐为引擎、高度中心化与模块化并存的“资本聚合网络”,其运营遵循市场自由主义逻辑,我们中国则架构了以行政整合与战略协同为纲领、强调闭环与可控的“系统协同网络”,其运营深嵌于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本文通过社会网络的“结构透视”,不仅揭示了两种模式的内在机理与优劣,更深入探讨了其面临的“创新悖论”与“生态失衡”等结构性困境,为理解全球融媒体发展的多元未来提供了批判性思考和运营性归因。

关键词

社会网络分析;融媒体运营;媒介生态;融合文化

1 引言

我们正置身于一个媒介形态疯狂滋长、交融与蜕变的时代,从纽约的华尔街到北京的中关村,“融媒体运营”已不再是前沿概念,而是所有媒体机构谋求生存与发展的必修课。然而,一个引人深思的现象是:尽管技术工具全球同步,

商业模式相互借鉴,但中美两国所呈现出的融媒体生态景观却大异其趣。美国的融媒体版图由科技巨鳄与传媒大亨的资本棋局主导,充满了并购、拆分与算法黑箱的戏剧性;而中国的融媒体变革,则更像一场由国家主导、层层推进的系统性工程,强调协同、可控与赋能社会治理。

现有研究对此现象的解读,多集中于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宏观批判或媒介产业论的效率分析,这些视角固然深刻,却往往像在观察一盒巧克力,只能描述其外在形状与包装,难以解析其内部核心的分布、糖分的结晶结构以及各种配料是如何粘结在一起的,换言之,我们亟需一种能够透视其内在关系结构的理论工具。

【作者简介】胡朝阳(1972-),男,土家族,中国湖南凤凰人,硕士,副教授,从事广告传播、媒体设计、新媒体广告等研究。(本研究/成果/论文得到江苏省高校优秀中青年教师和校长赴境外研修计划资助。)

社会网络分析正提供了这样一台“社会CT机”，不将媒体机构视为孤立的原子，而是将其还原到由平台、用户、内容、资本、算法与政策构成的复杂关系之网中，通过分析节点、连接、网络密度、中心度与结构洞等要素，揭示那些隐藏在表象之下的、决定信息流向、权力分布与创新活力的深层结构动力，旨在回答从关系网络的视角看，中美融媒体运营截然不同的网络构型和多元生态。

2 研究理论：社会网络分析作为融媒体研究的“结构显微镜”

本文将社会网络分析应用于融媒体研究，意味着方法论的本体论转向——我们将“关系”而非“实体”作为分析的基本单位，构建一个多层次的理论框架：

节点与连接。网络的基本构成原子。在融媒体网络中，节点可以是任何能动的行动者，一个媒体机构、一个自媒体账号、一个平台、一个用户，甚至一个核心话题都能成为，连接则是它们之间动态的关系，如所有权关系（资本纽带）、内容分发关系（平台—创作者）、信息交互关系（转发、评论）、算法推荐关系（内容—用户）以及行政隶属关系，这些连接并非均质，其强度、方向与内容共同定义了网络的本质。

网络结构的关键度量。罗纳德·伯特的结构洞理论指出，网络中关系稀疏的地带蕴藏着巨大的信息优势和控制收益，融媒体运营的战略高地，即在于能否敏锐地发现并桥接这些“结构洞”，连接起原本隔绝的群体、内容与资源，从而成为不可或缺的创新枢纽。融媒体运营的目标，往往是在维持专业社群（高聚类）的同时，去打通跨社群连接的捷径，构建自身的“小世界”，从而在网络构建中形成比自身强大得多的同频效果。

融入宏观理论视角。媒介生态学是将媒介网络要素置于一个宏大的动态系统中考察，强调技术、平台、机构与用户之间的共生、竞争与演化关系。而亨利·詹金斯的理论为网络中的“内容流”提供了文化动因的解释，它关注内容如何跨平台流动、受众如何迁移，以及参与式文化如何自下而上地重塑网络连接。因此将中美融媒体运营视为两种不同的“社会网络物种”，从网络生成机理、内部结构形态、关键节点行为策略三个层面进行深入的比较解剖，社会网络分析作为融媒体研究的“结构显微镜”，也意义重大。

3 对比研究：美国的“资本聚合网络”和中国的“系统协同网络”

美国的融媒体生态，是一场由资本和算法共同导演的、永不停歇的“结构重组”大戏，其社会网络在市场的自发演化下，呈现出“资本聚合”的典型特征，市场“看不见的手”与算法“隐形建筑师”共同作用，相得益彰。首先，美国网络的形成，其原始动力是在于本对垄断租金和规模效应的无尽追逐，历史上有线电视网络的整合，当下流媒体平台的混战，以及近期派拉蒙（Paramount）与 Skydance

Media 的合并案，都是同一逻辑的延续。同时，算法推荐则作为“隐形建筑师”，日夜不停地进行着网络的“微调”和“编织”，它基于用户行为数据，动态地创建、强化或削弱内容与用户、用户与用户之间的弱连接，它不像资本并购那样惊天动地，却以一种更细致、更广泛的方式，定义了人们看到什么、与谁互动，从而形成了无数个以兴趣和观点为边界、内部高度同质化的“算法社群”，这些社群内部连接紧密，但彼此之间却可能存在着巨大的“结构洞”，导致了舆论的极化与社会的“数字部落化”。其次，Meta、Google、Apple、Amazon 等科技巨头是融媒体大鳄，凭借其庞大的用户基础和基础设施，拥有无与伦比的接近中心度，而传统的影视巨头、新闻集团等，依赖平台分发围绕恒星运转，通过自身的内容引力（如 IP、品牌）形成自己的卫星系统（如 Disney+ 的订阅用户）。再有，海量的中小媒体、自媒体、influencers 则构成了弥漫的“星云”和偶尔划破天际的“彗星”，这高度依赖于星系的核心引力，其兴衰往往取决于能否被算法“星探”发现，或成功依附于一颗强大的行星。

基于此，美国的融媒体这种结构决定了其“模块化生存”的特性，Netflix、游戏直播平台 Twitch、专业财经媒体 Bloomberg 等，都在各自的垂直领域内构建了内部高效协同、体验闭环的子网络。它们与外部网络的连接是选择性的、策略性的，主要通过 API 接口、平台合作或 influencers 的跨平台活动来实现。在这种充满竞争与机遇的网络中，成功的运营者必须是精明的“网络结构策略家”。一个成功的科技博客（如 The Verge），其价值恰恰在于它同时连接了科技公司、硬核极客、普通消费者和投资机构这些原本沟通不畅的群体，通过填补这个“结构洞”，获得了信息差、信任中介和创新策源的地位，在商业上，这直接转化为广告收入、行业影响力和话语权。而融媒体运营极度重视在社交媒体上建立海量的弱连接粉丝，一条病毒式传播的推文，其威力不在于说服了深度认同者（强连接），而在于触达了无数原本不相干的“围观者”（弱连接），实现了品牌的指数级曝光和引流，其运营逻辑是“广种薄收”，通过内容的爆发力撬动算法，进而激活弱连接网络。

与美国的市场自发演化形成鲜明对比，中国的融媒体发展和转型是一场目标明确、路径清晰的“社会网络工程”，其核心是构建一个高效协同、可控可管的“系统协同网络”。中国融媒体网络的建设，是对传统媒体时代“有系无统、条块分割”网络结构的系统性改造，中央通过《关于加快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等顶层设计，行政力量扮演了“总工程师”的角色，县级融媒体中心在全国范围的铺开，“全国广电新媒体联盟”成立，以及北京广播电视台“听听 FM”与海淀区融媒体中心“中心+公司”等模式的探索，本质上都是在用行政和市场的复合手段，重新“焊接”网络连接，将分散的节点整合成一张统一调度的网络，其目标不仅是信息传播，更是构建现代传播体系，赋能社会治理。融

媒体形成“同心圆”模型与闭环化运营模式。在以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中央媒体为核心节点，被赋予了最高的接近中心度，能第一时间获取权威信息，并通过其强大的新媒体矩阵，将信息辐射至全网，发挥着“定盘星”和“压舱石”的作用。省级融媒体中心、市级融媒体中心构成网络的协同层，在重大新闻报道中，“全国一盘棋”的协同结构，能爆发出巨大的声量，形成舆论合力。而融媒体的网络最外层，是各类垂直领域和地方性的应用，其突出特征是追求“生态内闭环”，无论是重庆广电《谢谢你来了》节目打造的“内容+电商+公益”生态，还是“北京节节高”服务共同体联动文商旅体，其战略意图都是在自有或可控的平台矩阵内，完成从信息获取到用户沉淀，再到政务办理或商业转化的全过程，构建一个内部连接强、外部边界清的闭环子系统。与美国追求弱连接的广度不同，中国模式更擅长挖掘强连接的深度价值，通过构建微信社群、粉丝会等，将用户转化为具有高信任度和粘性的“自己人”，进而引导其参与线下活动、使用本地服务或进行消费，这种基于强信任的转化，效率更高，社会效益也更显著。中国融媒体的发展模式优势在于，其无与伦比的系统动员能力和舆论引导效率，在突发事件、重大主题宣传或国家动员中，这套网络能够迅速统一思想、协调步调，展现出强大的合力。

4 社会网络视角下的深度对话与批判反思

从对比研究发现，美国网络的中心化是资本与技术的中心化，其权力核心是硅谷的服务器集群和华尔街的资本算盘，中国网络的中心化是行政与战略的中心化，其权力核心是国家的舆论阵地与意识形态安全，两者都面临“如何制约权力”的经典问题，但解题思路截然不同，前者诉诸反垄断法和公共舆论监督，后者则依赖于体制内的自我革新与顶层设计优化。

在美国，结构洞是个人与机构上升的阶梯，但其带来的信息扭曲和利益冲突也需要法律和行业规范来治理，而在中国，结构洞的桥接功能更多由系统内的关键节点（如全国性联盟、政务平台）有组织地承担，这保障了连接的规范性与安全性，但也可能减少了网络自我演化的意外惊喜。美国的融媒体模块化网络像一片热带雨林，局部火灾（某个平台衰落）不会导致整个系统崩溃，新的物种（创新应用）会迅

速填补生态位，但其发展轨迹充满不确定性，中国的协同网络像一片精心管理的稻田，抗灾能力强、单位产出（舆论引导效能）高，但生态系统的多样性相对较低，其演化路径更具可预测性和规划性。

5 结语

通过社会网络分析的深度解剖，本研究清晰地揭示出中美融媒体运营的差异，本质上是两种社会网络构型的差异，一个是市场“看不见的手”与算法“隐形建筑师”共同塑造的“资本聚合网络”，另一个则是国家“看得见的手”主导规划的“系统协同网络”，它们根植于各自的政治经济土壤、文化传统与发展阶段，各自在其融媒体运营领域发挥着内在的逻辑和优势。

展望未来，融媒体运营的这两种网络都面临着在动态平衡中寻求优化的课题，美国的“资本聚合网络”需要在激发创新活力与修复公共领域、防止过度中心化之间找到新的平衡点，中国的“系统协同网络”则需要在保持系统合力与激发末端创新、扩大内部闭环与增强外部连接之间实现更高水平的动态统一。笔者认为，理想的未来融媒体生态，并非二者择一，而是能够汲取彼此智慧，在必要的领域保持协同的效率，在创新的空间赋予个体连接的自由，从而在社会网络的发展中找到自己的立足点和平衡点，在解码复杂的融媒体现象时具有强大解释力，爬取真实的互动数据，绘制可视化的图谱，从而使我们在让这场媒介构建的“真实”中，有更加坚实的受众基础和更为精确的数据支撑。

本研究 / 成果 / 论文得到江苏省高校优秀中青年骨干教师和校长赴境外研修计划资助。

参考文献

- [1] Burt, R. S. (1992). *Structural holes: The social structure of competiti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2] Jenkins, H. (2006). *Convergence Culture: Where Old and New Media Collide*.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 [3] 彭兰. (2020). 媒介融合的“最后一公里”：人的连接与规则的再造. 《当代传播》，(4), 4-9.
- [4] 隋岩. (2018). 群体传播时代：信息生产方式的变革与影响. 《新闻与传播研究》，25(1), 5-24.
- [5] 朱春阳. (2019). 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模式、困境与路径. 《新闻与写作》，(2), 1-7.